

李庚辰 著

杂文写作琐谈

2.11.9 1708

长征出版社

杂文写作琐谈

李庚辰 著

长征出版社

封面设计： 仓小宝

杂文写作琐谈

李庚辰著

*

长征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阜外大街34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二二三〇工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印张 80千字
1982年7月第一版 1982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48,000

统一书号：9268·001 定价：0.44元

前 言

杂文是一种源远流长，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体，自古迄今，一直在我国文坛上占有未可忽视的一席之地。到了现代，经由鲁迅先生的率先开创，推陈出新，使杂文创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无论思想内容、艺术风格，乃至题材范围，都一新其面目。在人民革命斗争中，杂文更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杂文作为文艺性的社会论文，不仅读者广泛，而且作者众多，其中有大量的业余作者和习作者。这是杂文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可靠保证。

笔者担任报纸的杂文编辑工作，业余时间也写一点杂文。因之，同许多有成就的和初学的杂文作者交上了朋友，不时和他们共同研讨关于杂文写作方面的意见和主张。也有不少杂文习作者常常找上门来，提出一些关于杂文写作的问题和疑难，要求编辑帮助解答。这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因为我也不过是一个“半瓶子”。言不及义，以讹传讹，是要打屁股的。但是没办法，既然你是“编辑同志”，人家就信任你；不管你情不愿意，能不能够做出令人满意的解答，人家还是找你“请教”。这样，也就逼着自己不得不对杂文写作

做一点认真的理论方面的探讨。于是，也就在重点研究鲁迅杂文和时下杂文，以及杂文习作中的问题的同时，涉猎了所能看到的不同时期关于杂文写作的研究成果，以期介绍给诚恳求学的习作者。又由于难以同这些同志一一交谈，于是，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提议、支持和帮助下，便在《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等报纸的写作《通讯》上，辟了个《杂文写作琐谈》的专栏。不曾想，今天“谈”一篇，明天“谈”一篇，谈来谈去，居然凑了二十几篇。这时，就有一些杂文作者来信来访，有的是索要“琐谈”，有的是要求、鼓励我将这些“琐谈”汇集成册。

感谢长征出版社同志们的大力帮助，使《杂文写作琐谈》得以编印成书，同大家见面了。当然，尽管拙作吸取了一些杂文家和文艺理论家的研究成果，但由于笔者水平有限，加上可能“消化不良”，这本书肯定会有许多不足之处。聊可自慰的是，笔者整天徜徉在杂文稿件堆中，比较熟悉杂文习作中的问题，因此，所谈尚具有明确的针对性，或可作为习作者之参考。再者，从鲁迅以来，我国杂文作品浩如烟海，但普及杂文写作知识的比较系统的著作尚未看到。拙作权当引玉之砖，并望杂文大师、杂文作者和广大读者不吝指正。

作 者

1982年5月

目 录

前言

杂文的基本概念	(1)
杂文的选题	(6)
杂文的主题	(12)
杂而不杂	(18)
杂文的标题	(24)
杂文的逻辑性	(30)
杂文的议论说理	(37)
杂文的形象性	(45)
杂文的叙述	(51)
杂文的描写	(58)
杂文的抒情	(63)
杂文的比喻	(69)
杂文的用典	(75)
杂文的讽刺	(83)
杂文的幽默感	(90)
杂文的结构	(96)
杂文中的对比	(102)
杂文的开头与结尾	(108)

杂文 的 语 言	(114)
杂 文 与 生 活	(120)
杂 文 与 杂 家	(127)
杂 文 与 诗	(132)
杂 文 与 格 言	(138)
杂 文 习 作 常 见 病	(143)
杂 文 写 作 中 应 注 意 的 问 题	(148)

杂文的基本概念

报纸的文艺副刊和各种文艺刊物上，经常刊登一些论说短文，它们格调不一，内容广泛，生动形象，言词犀利，一般放在版面的较重要位置，往往还要用楷体字刊印，并框上花边，以吸引读者的注意。这类文章，多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杂文”。

杂文是文学体裁之一。它作为散文的一种，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的序言中说：“凡有文章，倘若分类，都有类可归，如果编年，那就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成了‘杂’”。这就是对杂文概念的总概括。远在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著述中便有不少属于杂文一类。庄子的《逍遥游》、《秋水》，荀子的《劝学》，韩非的《说难》，都具备了杂文的特征；唐朝韩愈的《原毁》、《师说》，以及罗隐的杂文集《谗书》，皮日休的《皮子文藪》、罗龟蒙的《笠泽丛书》中的大量篇章，也都为杂文所属；宋代苏轼的杂记、杂说，指点江山，评人论事，夹叙夹议，随笔挥洒，“言必中当世之过”，“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其杂文写作手法已

达到他自己所说的“大略如行云流水”这样灵巧纯熟的程度。到了近代，五四运动以后，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作家，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为着抨击时弊，揭露痼疾，宣传民主与科学，广泛而大量地运用了杂文这一武器。这些杂文大都针对反动统治下荒谬的社会现象，以其深邃明晰、尖锐犀利的思想，汪洋恣肆、气象万千的风貌，揭微显隐，针砭要害，“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如匕首、投枪一样刺向敌人，表现了坚强的战斗力，开创了杂文的新面貌和新风格，使杂文成为新文学百花园中一朵娇艳雄峻的奇葩。建国以来，革命作家继承了“五四”以来战斗杂文的传统，对有害的事物立即给以抗争或抨击，对新生的、进步的事物则给以热情支持和歌颂，使杂文成了“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

杂文的基本特征，可以粗略归纳为三点：

首先，杂文是战斗性文体。鲁迅先生认为，杂文虽然“不敢说是诗史”，但它“有着时代的眉目”，是时代的“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杂文应该“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鲁迅先生终其一生写的数百篇杂文中，篇篇无不针对腐朽反动的旧制度、旧人物、旧事物，上自最高反动统治者，下及他们豢养的文探、叭儿，外自侵略强盗，内迄人面畜类，都是他鞭挞指斥的对象。杂文

的这种战斗功能使它和社会现实的脉搏息息相通、一起跳动，每当社会斗争发生急速变化，杂文总是率先出现，以最快捷的速度，最鲜明的风格，提纲切要地表达人们的思想和意见，揭示和推进事物发展的进程。在粉碎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各类报刊上出现的大量战斗性很强的杂文，正是杂文战斗性职能的充分体现。我们了解了杂文的这一特征，就要自觉地运用杂文武器，为我们现实的斗争服务，推动我们事业的前进。譬如，我们正在从事四化建设，那么，一切妨碍、迟滞、破坏四化建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杂文针砭批判的对象；同时，一切推进四化建设的好人、好事、好思想、好作风，又都是杂文讴歌褒扬的对象。对旧事物的针砭批判和对新事物的讴歌褒扬，同是杂文战斗性的标志。

再者，杂文是文艺性的政论。就其涉及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来说，也可以说是文艺性的社会论文，是文艺性和议论性文体的杂交品。这是杂文的本质性的特征，也是杂文之所以称其为杂文的根本之所在。杂文的这一特征，使它既具备文艺的要素，又是议论性文体，既有形象性的要求，又有严密的逻辑力量，既要以情感人，又要以理服人。它寓形、情、理于一炉，融政论和文艺为一体，而又区别于一般政论和文艺创作。（杂文与一般政论的区别，在于它的运用文学语言状物言事的文艺性；杂文与一般文艺创作的区别，则在于运用逻辑推理的方法揭露事物本质的说理性。）可以说，杂文是说理

性的文学作品，也可以说，杂文是形象化的社会论文。这是它不同于其它文体的独特之处。

杂文的这种文艺性的社会论文的本质，决定了杂文写作中常常采用典型化的艺术手法。杂文的取材是典型化的；杂文的议论是注意典型形象的描绘的。鲁迅先生称他自己的杂文“砭锢弊常取类型”，而这“类型”，又“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象，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这就是典型化方法。尽管杂文所写的人或事往往是具体的、个别的、粗线条勾勒的，但它是经过作者精选的、具有“图”或“标本”的作用，是大量的“相象”或“相同”的人或事的代表，因而在本质上它仍然是概括的、普遍的、具有典型意义的。鲁迅先生《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中刻画的“叭儿狗”，就是杂文写作中典型化手法的典型运用。那种“虽然是狗，又很象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的人物，在国民党的走狗文人中实在是屡见不鲜。抓住这一典型形象鞭答抽打，必将使其同类们避匿不能、体无完肤。先生在《二丑艺术》中又用“身分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的“二丑”这一典型形象，将所谓“自由人”、“第三种人”等等标榜着各种名目的形形色色的反动文人，以反革命两面派手段欺骗群众、为国民党反动派“小骂大帮忙”的丑恶嘴脸，赤裸

裸地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种描绘典型形象的方法，使杂文避免了单纯的逻辑推理，把议论和形象融为一体，使之声色并茂，神形俱活，情通理顺。这一杂文的本质特征，是杂文的突出优长。

短小精悍，是杂文的又一特征。本来，任何文体都避忌冗长罗索，而杂文尤其如此。它的“感应的神经”的敏感性，要求杂文的产生要迅速敏快，立见成效；它的“匕首”、“投枪”的战斗职能，又要求杂文短小锋利，一针见血。杂文的快和短，既是斗争形势的迫切需要向它提出的战斗化要求，也是杂文的艺术风格、艺术特点所固有的规律。其次，杂文的快和短，又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既然快，就不可能是鸿篇巨制、洋洋万言的长篇大论；正因为短，才能够象电光石火一般机敏反应。而快和短，又是杂文短小精悍的必然要求。鲁迅先生的杂文不少是几百字到千把字的短文，时下报刊的杂文也以“千字文”居多。用这样短小的文字而将宏大的题旨、丰富的思想熔铸其中，便不能不在“精”字上用些气力。事实上，大凡优秀的杂文，都象眼睛里容不得砂子一样容不得一个闲字，那种故弄玄虚、卖弄学问的掉文袋习气，那种哼哼哈哈、钝刀子割肉的半死文风，那种东拉西扯、言不及义的学究式说教，那种言之无物、隔靴搔痒的空话泛论，都与杂文短小精悍的战斗气质大相径庭，是为杂文所不取的。

杂文的选题

时常听到一些杂文作者讲：“杂文好写，题目难选！”

说“杂文好写”，这里的道理比较明显。因为杂文是“匕首”、“投枪”一类的“轻武器”，比起“飞机”、“大炮”、“原子弹”来，毕竟容易掌握。从这个意义上说，的确是“好写”一些。说杂文的“题目难选”，就不完全确当了。应当说，杂文的题目，是又难选，又不难选的。

说题目难选是由于，杂文所反映和论述的常常是社会生活和现实斗争中的重大问题，而它的篇幅又比较短小，以小篇幅反映大问题，这就是它的难点所在。但是，杂文选题也有不难之处，这是由于，毕竟它的篇幅比较小，而篇幅小，突破口就要小，这就便于从一人一事一语一物入手拟题撰文，这样，反而比“大块头”文章好办些。

那么，到底怎样才能把杂文题目选得准呢？

我想，首要一点，是要明确杂文的战斗职能。

如前篇所述：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

足”，“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杂文“作者的任务，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这就是说，杂文是战斗性文体，是投向“有害的事物”的匕首和手榴弹。它是抨击腐朽，针砭时弊，为新生的革命的事物呐喊开道的战斗武器。

正因为杂文是战斗武器，也就不可避免的有一个锋芒所向的问题，这也就给杂文选题提出了“必须准确”的严肃的任务。

杂文作者要自觉遵循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党中央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在现阶段，就要紧紧围绕建设四化、保卫四化和四项基本原则这些带根本性问题，紧密配合形势、任务和中心工作，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愿望和呼声，热情讴歌四化建设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社会主义新道德、新风尚，对于一切妨害四化建设，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错误倾向和不良作风，则要进行坚决的斗争，使杂文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是杂文的根本任务，也是杂文选题的根本前提。离开了这个前提，也就离开了杂文选题的正确方向。

在这个前提下，还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全局着眼。这里说的全局，首先是党和国家的大局，是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问题和任务。比方说，我们今天工作的中心是搞四化，那末，四化就是大局，四

化斗争中的形势、问题和任务，就是杂文作者应当经常研究和清楚了解的课题；而要了解全局，就要站得高，看得远，也就是要站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高度，不仅看清斗争的历史和现状，看清形势和任务中哪些是当前最突出、最令人关心、因而是一捅就响的问题，而且还要了解它的发展趋势，预见到斗争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才可能找到选题的大致方向。鲁迅杂文的选题总是立足于全局，注意于现实斗争中的问题和它的发展趋势，并十分注意其对于全局的利害。就拿《庆祝沪宁克服的那一边》来说，该文写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十日蒋介石搞“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的前夕。当时，“纪念和庆祝的盛典似乎特别多”，革命的人们正沉浸在北伐胜利的欢乐中。可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却已暗暗地向革命人民举起了屠刀。透过漫漫重雾，鲁迅敏锐地觉察到形势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尖锐地指出，“最后的胜利，不在高兴的人们的多少，而在永远进击的人们的多少”，并引用列宁的话，提出了“第一要事是，不要因胜利而使脑筋昏乱，自高自满；第二要事是，要巩固我们的胜利，使他长久是属于我们的；第三要事是，准备消灭敌人，因为现在敌人只是被征服了，而距消灭的程度还远得很。”他象预言似地明确告诫人们：“小有胜利，便陶醉在凯歌中，肌肉松懈，忘却进击了，于是敌人便又乘隙而起。”这些真知灼见，包含了他对当时的斗争形势

及其发展动向多么精辟正确的观察！如果不对全局成竹在胸，是绝对不可能写出这样高屋建瓴、卓绝独到的文字的。再如，粉碎“四人帮”之初，国内外有不少人被“四人帮”长期伪装的“革命”假象所迷惑，误认为他们是“左派”、“激进派”。从全局来看，撕破这一假面，对于揭批“四人帮”反革命本质，教育受蒙骗人们，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时，《刮掉鬼脸上的雪花膏》、《红纸包里的烂肉》等战斗性很强的杂文见诸报端，以犀利的笔触，深刻揭批了“四人帮”反党反人民的罪恶本质，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对推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起了积极作用。可以说，写杂文而离开了全局，无异于为战士而离开了战场，那是一定打不到点子上去的。

二、一点着手。从全局着眼，将选题的方向和范围确定以后，下面，就是个进一步选择突破口的问题了。这个“突破口”，也就是杂文的具体题目。军事意义上的突破口，是集中兵力于敌人最要害、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一点，由此突入敌阵，继而扩大战果，全歼敌人。杂文的“突破口”也具有类似的性质，它是关联着全局，而又是最要害、最敏感、最容易捅得响的问题。它是“一点”，却是战斗的“突破点”；它是“一发”，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发”。它是从大处着眼，又是从小处落笔的。这种全局与“一点”，全身与“一发”，大处与小处的辩证的统一，正是杂文选

题的奥妙所在。仍以鲁迅杂文为例：一九三一年，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国民党反动派屈膝媚外，而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纵容日寇侵略，妄图乘机瓜分中国的严重现实，鲁迅先生居高临下，统观全局，从千头万绪中抓住了“友邦惊诧”这个要害问题，从这一点入手，由小及大，以短见长，纵横驰骋，层层剖析，深刻揭露了中外反动派妄图灭亡中国的卑鄙丑恶嘴脸。（见《二心集·“友邦惊诧”论》）这样去选题，可真是一针见血，一语破的，高明之至！在揭批“四人帮”的杂文中，《王洪文的“标准像”》（见《除四害杂文集》）的选题也很有匠心，它从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全局着眼，通过“标准像”这一点，议论风生，喜笑怒骂，赤裸裸地揭露出王洪文反革命两面派的丑相，妄图篡党夺权的凶相，和政治暴发户的流氓相。透过这一张“标准像”，使人们看清了“四人帮”一伙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的狼子野心。许多范例都说明，“一点着手”，是杂文选题的成功经验，离开了这一“点”，就象小猫咬皮球，是无从下口的。

三、亲身感受。一篇杂文题能不能选好，除了上述两点以外，还与作者对所论问题有没有亲身感受有极大关系。常有这样的情形：编辑部向作者出了题目，约写某篇杂文，可是，其效果往往不好，不是作者写不出来，就是写了出来却不大合用。查其原因，都与作者对约写的问题缺乏深入了解和深切感受有直接关系。相反